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9074048

10位ISBN编号：7309074041

出版时间：2010

出版社：复旦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王汎森

页数：18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前言

我一向关心近代史学史方面的问题，但是从未有写成专书的计划，而是以有什么就写什么的方式，希望最后能累积成一本集子，题为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。在我原先的构想中，除了以前发表而未收入本书的几篇之外。至少还有一些正在构思的文章（譬如刘咸忻的史学）。但是因为平原兄最近积极催促我整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书加入“三联人文书系”，所以进一步的增添必须俟诸他日了。本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，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，偏重的是“变”的部分，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，旧史本身的风貌。在将近三十年中，史学的意义、题目、史料、方法、概念、词汇、评价、叙事架构等都起了重大的变化，以至于要想回过头去用传统方式写史，几乎不可能。譬如在近代以前，人们多用“史”而罕用“历史”，近代则用“历史”而少用“史”。由“史”到“历史”，在隐微之间有某种深刻的改变，这一类改变在近代的史学实践中可谓不胜枚举。收在本书中的五篇文章，对前述变化有若干讨论，此处不一一介绍。在这篇短序中，我倒是想记录我在思考近代史家与史学时的一些想法。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内容概要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，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，偏重的是“变”的部分，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，旧史本身的风貌。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作者简介

王汎森（1958—），台湾云林人。中研院院士，史语所所长。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。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，旋即入伍服役。1985年任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1987年，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。1993年，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，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。王汎森（1958—），台湾云林人。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。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，旋即入伍服役。1985年任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1987年，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。1993年，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，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。1998年，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。1999年，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章太炎的思想》（1985）、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》（1987）、《Fu Ssu—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》（2000）、《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》（2001）。（主要著作有：《章太炎的思想》（1985）、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》（1987）、《Fu Ssu—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》（2000）、《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》（2001））。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书籍目录

序/1

1、晚清的政治概念与“新史学”/1

2、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
——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探讨/29

3、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
——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/69

4、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
——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/103

5、钱穆与民国学风/141

作者简介/185

著述年表/186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章节摘录

六、化经为史社会进化论看任何事物皆认为有一个长期的进化历史，梁启超说，“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，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，政治法制之变迁，进化也；宗教道德之发达，进化也；风俗习惯之移易，进化也。”这个观点对20世纪初年的史学影响最大。把过去认为是一时一人制作之事物拉成一条逐步进化的轨道，把并时性的拉成是纵贯的、历时性的。我们很难想象，那些原本习惯于三代名物制度都是圣人制作的学者，如何转变他们的思维模式。刘师培写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时，标榜自己与其他著作之不同点，就是要弄清“社会进化之阶段”，“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”。所以讨论任何礼俗、宗教、道德问题时，刘氏不再只当作某一特定时期圣人制作之物，而是配合着历史环境之变化来观察它们的进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只有社会进化论，史家似乎还不知道怎么着手，反倒是前述《社会通论》等社会学译本揭示了“图腾 - 宗法 - 军国”等等之类的历史“公例”，适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叙事架构（即“进化之阶段”）。既然这类“公例”是“万国各族”所共历的一“故凡今日文明之国，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”，“天下万国，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，而期有长短”。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编辑推荐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：人文书系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精彩短评

1、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和钱穆与民国学风两文尤好，解释了在近世经史重构，和在现代研究方法下大量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，史学家角色的转变，特别是重建了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、辨证关系，以及其学术转向对现实的迫切呼应。本质上胡适和傅孟真的科学主义学术梦想在近代中国必然失败，去价值规范的学术中立和标准化的学术路径决定了“重估文明价值”“再造文明之梦”不足以应对左翼直接的意图伦理的现实政治指导（用唯物主义和马列进行研究必然得出同构的结论，中国社会必然的规定性反证革命的必然性，是必然证明必然，但直接热切的呼应了时代主题），也无法面对取中国文化精义，引导国民对国家、民族的基本“信念”，最终实现文化、科学、民主、革命四体同构的文化保守主义者，如钱穆和戴季陶，乃至蒋介石本人，和更加关怀民族心性义理的“边缘知识分子”如梁漱溟、熊十力等。史学应有终极的价值关怀，是建立在价值中立化和学术规范性之上的，超越意图伦理的价值关怀，在近现代-国家民族建构，知识分子中心-边缘矛盾和外部的直接救亡威胁之下，时局并没有给胡适等文明-规范路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更深入的话语空间，而不得不陷入现实政治与现代学术的一团矛盾之中，如七七后胡适陶希圣条陈承认满洲国的时局策，九一八后傅斯年急做漏误的《东北史纲》等，多数是急切但无力、乃至错误和自我违背学术规范性的应时之声，多重思想资源，多重问题背景，压力深重矣

2、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，貌似会分门别类地总体介绍近代中国的史家和史学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是一篇文章汇编，收集了王先生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，而它们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、历史学有关，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专题的论述，是通过史家与史学来论证某些结论性的观点。书的内容十分丰富，信息量很大，作者眼界深邃，不但让人了解到了许多并不熟悉的史实，更重要的是让人在对中国史学于近代的变迁有了一个广泛的认知，并且深刻体会到了民国时期整体的学术状态，实为受益颇多。

3、这本书的题目叫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，作者在序中交代，本书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，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，偏重的是“变”的部分。第一篇“晚清的政治概念与‘新史学’”，作者讨论了近代中国史学三次革命中的第一次——以梁启超的《新史学》为主，重新厘定“什么是历史”。（P2）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《中国史叙论》和《新史学》两篇文章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作者认为，学界对这两篇文字的讨论多从史学的内部展开，忽视了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成这场史学革命，而这正是这篇文章的叙述重心。在《新史学》中，梁启超格外重视“国家”、“国民”、“群”、“社会”的历史，这些“概念工具”在传统中国很少出现，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它们塑造了这场史学革命。此后，作者以梁启超为中心，梳理了“国家”、“国民”、“群”这三个晚清时期出现的新概念的形成与衍化过程。作者总结认为，梁启超开启的史学革命形成了中国“有史”、“无史”的争论，但无论是国粹派还是立宪派，不分“无史”论者或“有史”论者，他们最后都隐然认定历史应该是“民史”、是“公史”、是“社会史”、是群体的历史，这对后来的史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（P28）第二篇“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——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”，作者指出，相对于循环式的或退化式的历史观，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、有意志的、导向某一个目标的，或是向上的、不会重复的、前进而不逆转的。关于近代中国这一思想的历史源头，作者认为或与四种学说有关：一是康有为所阐发的“公羊三世说”；二是各种带有目的性、评价性的历史分期；三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欧洲“文明史”观。四是进步观和社会进化论。本文以第四点为论述重心。先是严复《天演论》所高举的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口号对社会形成了莫大的震撼。继而一大批带有社会进化论意味的西学书目输入中国，线性历史观逐步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国民认识。作者认为，近代中国线性历史观的形成，并非出自史学本身的因素，而是一种现实的渴求。（P38）为了成了西方一样的强国，而将西方历史发展的历程作为世界的“公例”，中国也必须按照这一公例进行发展。此后“化经为史”、（P50）马列主义的“五阶段论”都是线性历史观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的结果。（P64）作者认为，这一单线进化的历史思维既规定了“公例”，又定下了进化的“阶段”或“阶级”，仿佛每一个阶段都需经理，不可跳跃，这就忽视了历史现象可能多元并存的状态，也忽视了历史状态可能出现进而复退，退而又进，进、退交杂的现象（P68）第三篇文章“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——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”，作者选取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廖平和其弟子蒙文通为论述重心，考察“化经为史”的学术变迁中，知识学人的心路历程。第四篇文章“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——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”，作者讨论了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与旧观点之间的更迭，认为傅斯年的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新史料观基本是从西方来的，它深受知识界的信服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生态有关；同时，新史学观念影响力的逐步开展与史语所这个新的学术建制密切相关，同时也得益于与这一派史学关系密切的机构和刊物。在新的史学观念的影响下，治学方式从传统的读圣贤经典变为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材料”。第五篇“钱穆与民国学风”，作者梳理了1949年以后钱穆的学思过程；重建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、辩证关系；讨论了这个对话辩证历程的学术思想史意义。这三件事的梳理都试图对“如何同时是中国的，又是现代的”这一主题进行回应。其中，关于钱穆学思过程，作者叙述了钱穆与胡适的分合往事，借此认识钱穆思想的特质以及他与1920年代各种思潮的异同。（P166）应该说，以上者五篇专论文章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。我因为研究晚清十年的修律变法，所以对晚清十年的学术史、思想史更为关注。具体在这篇文章中，前两篇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。作者王汎森认为，晚清史学革命的发生，深受时代局势的促成，具体而言，正是政治思潮中诸如“国民”、“群”、“社会”等概念从西方席卷而来，才引发了梁启超等人历史认知的重构。同时，也正是西学的强大影响力，学习西方成为世界“公例”逐步成为晚清朝野的主流共识，因此线性历史观才得以大行其道，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。对于线性历史观（社会进化论），作者有着“时代使然”的必然论调，但同时指出了这一单一认识模式的局限。实际上，这一观点在其师余英时新近著作《论天人之际》中已然表达了。在该书的序言中，余英时认为，历史演进一元论及其近似概念的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，这些近似概念还包括西方中心论、上古—中古—近古的历史分期、斯大林的五阶段论以及一度在美国盛行的“现代化理论”，从而开启了作者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化多元论（见《论天人之际》，中华书局2014版，代序）

4、1、晚清的政治概念与“新史学”/14、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——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/103所以买这本书只能买3篇新文章。

章节试读

1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78页

到了廖平，他想在时势的迫压之下，更积极地维护或创造经学式的恒常道理，故用最权宜的手法搅乱了大量的文本。廖平一方面是史学的，一方面是哲学的。他欣赏张惠言、陈寿祺、陈乔枏的经学，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即是因为他们讲家法、重条例，比较能够忠实地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，从某种角度说，即是比较重视学术史的还原。但这并不表示廖平是位史学家，他不安于停留在史实的层面，而要提高到一个层次来调动、安排，在真实与虚构的离合之间，建立一套义理系统。

2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54页

我们之所以能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是拜新史料之所赐，使得埋藏七八十年的一段曲折可以重见天日。在《胡适秘密书信及遗稿》中有钱穆的四通信，他们开始于1930年夏，结束于1931年夏，其中第一通是钱穆要求胡氏为其考证先秦诸子之书（即后来之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）作序推介。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知，胡适先是为丁文江之弟丁文治可能补考向钱穆关心，钱穆回答说：“其令弟丁文治已以平日积分，酌定等第，可免补考”，接着说“拙著《诸子系年》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，自谓颇有董理，有清一代考史记、订纪年、辨诸子，不下数十百家，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。。幸先生终赐卒读，并世治诸子，精考核，非先生无以定吾书，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，为之刊印，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。。。”胡适日记中并未提及此事，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序亦未写，后来该书出版颇费周折，先是拟列入清华丛书，而审查未获通过，最后才由上海商务于1935年出版。

3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15页

从史语所与李盛铎往复商洽的过程中，亦可以再度看出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更迭。当交易将定未定之际，李盛铎表现出他所挂念不置的，仍然是将来万一在这八千麻袋中继续发现宋版残页，仍应归他。在这关键性时刻，陈寅恪在1929年3月10日写信给傅斯年，从其中可以看出新一代史学家所看重的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。陈寅恪说：

此档案中宋版书成册者，大约在历史博物馆时为教育部人所窃，归罗再归李以后，则尚无有意的偷窃。……又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，与彼辈异趣，我以为宝，彼以为无用之物也。

4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47页

“并非《新青年》所倡导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流”（韩愈语）——不破除旧的，则新的不可能实现——式的思维。”

其中引用韩愈语误，应为“不止不行”，出自《原道》。

5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16页

所以当后来耗费大量人力整理这批档案而无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时，傅斯年会有所感叹，李济遂询以：“难道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？”</p></div>

6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30页

130页下引2：

Page 11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兹引一列。1929年10月23日李济致傅斯年函：“今日休息，却受了一阵闷气，因为要向地方上的‘要人’表示好意，联络感情，所以同此边高级中学校长请了一桌客。请的时候为正午，等到两点半钟才到。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，却把我们的事——按，即在安阳挖掘纠纷之事，一句也没说，只带了五个马弁，吃了一阵，扬扬而去，‘余今日乃知xx之尊也’。”

7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98页

由廖平到蒙文通，捍卫传统的方式显然是有所不同的。经学家的廖平要把“理想”与“事实”合一，要把“研究”和“应用”合一，要用经学指导人们未来“应该”如何。作为一个史学家，蒙文通在晚年的《孔子和今文经学》中批评他的老师廖平“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，但却把真正的三古制度搞得混乱了”。从“理想”到“事实”之间，蒙文通走了漫漫长路，他的成名著作（《古史甄伪》）旨在呈现历史“事实”，把一个用美德铸成的黄金古代拆散了，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，他仍不忘保全某种程度的理想价值。在放弃了经学式的信仰，在菲薄圣人讥短汤武之后，他仍然回过头来，以一位现代史学家的身份重新估定儒家的价值。

8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74页

廖平对孔子前后的看法，王汎森认为和天台宗的“判教”也就是“五时八教”有关，这纯属胡猜。他之所以猜天台宗，无非是牟宗三最推重天台，用天台宗所谓的圆教说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而判教有多家，如华严、贤首的判教，即有名的五教十宗说。廖平怎么会了解这些，他的学问根底不在这。王汎森估计也就看了牟宗三那本书，对佛教，尤其是中国大乘佛教，根本是一知半解。

9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52页

有意思的是钱穆对胡适的一些猜测，也都透露出羡慕交加的情绪。胡适的一些未必有意识的举动，钱穆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加以理解。在这一次见面时，胡适因未携带自己的刮胡刀而坚持不肯留宿，让钱穆觉察到一种新知识领袖的傲慢，而即将分手之际，胡适匆匆撕下日记一页写了自己的地址给钱穆，后来胡适也未曾主动联系，令钱穆感到相当失望。失望其实正是看重的表现。

10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45页

1922年胡适反击《学衡》所写的新诗《题学衡》：老梅说：“《学衡》出来了，老胡怕不怕？”老胡没有看见什么《学衡》，只看一本《学骂》！。。。。。

11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54页

其次，历史人物的意志与目的有道德的优劣，人物的意志与目的有时候与这个巨大的进化历程“体合”，但也有许多时候是分开的，这就形成了梁启超所谓的“二义”，在道德伦理方面有一种吊诡性的意涵。

12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62页

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之所以能迅速占得优势，有其时代的背景。清末以来的中国在列强环伺之下，经历了空前的挫败，同时也对西方的文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欣羨，创造了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，使得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西方的线性历史架构对现实政治的走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。

13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51页

当中做的最突出的工作，是对经书中名物、制度、风俗等方面的研究。刘师培《古政原始论》、《伦理教科书》等著作中，大量讨论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士相见礼，乃至文字、宗教、族制、氏姓，其特色都是展现从某一阶段逐步进化到另一阶段的过程，勾画出一幅历史变迁的历程；而且往往帮这些后人看来庄严的礼制，找到“渔猎->游牧->耕稼->宗法”的发展历程。即便在讨论儒家有关朋友、君臣、兄弟、夫妇的道德观的形成时，也是以逐步进化的方式拉出一个由原始到文明的线性历程，完成了化“经”为“史”的工作。

14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70页

15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79页

1912年，教育部宣布废止尊孔读经，其影响固然不可过度夸大，但亦不可小看，制度性的规定毕竟产生大规模的影响，读经已经不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。而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对经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施予最有力的抨击，“覆孔孟，铲伦常”的口号，影响异常深远，古来相传的种种正统观念彻底动摇了，划分知识群体的标准是“传统的”或“反传统的”，“中国的”或“西方的”。另一方面，随着新学制的建立，学术分科化，大学中的经科已成为众多人文学科之一，其任务与传统经学不同，它不再是生命的学问，而是成为众多学问领域的一种。从辛亥以来经过十多年，至少在主观层面上，人们觉得自己与“过去”应该是断裂的，不应该是延续的，断裂产生了距离，距离使得“审视”传统成为可能，当时虽然仍有一群研读经书的人，但是他们的取径变了，是以“观察”、“研究”者而非传统文化参与者的方式在阅读经典。经学没落，与寻求恒常道理的经学式思维的没落，只有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代才能体会，起而代之的是历史式的思维——那便是一切都在变，一切都会变，一切的变都会合理，恒常的世界破坏了，变成以人事证恒常之道理或以人事替代恒常的道理。

16、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的笔记-第155页

先说情绪上的原因。钱穆归纳他与胡适的交往，用了一个古典说：“颜觸见齐王，王曰觸前，觸曰王前，终不前。”胡适这位名震全国的学者未能积极回应钱穆，或许不以为意，日记上也全未提及，但对一个自负的青年造成了心理的屈辱，这种屈辱感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已经发生了，现在为一篇序文再度涌现。

《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